

朱士群
李远行
任 贻
著

Jieji Yishi
Jiaowang Xingdong
Yu Shehui Heliqing

阶级意识、 交往行动与 社会合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
社会政治理论的现代性话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朱士群
李远行
任 暄
/ 等著

阶级意识、 交往行动与 社会合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
社会政治理论的
现代性话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阶级意识、交往行动与社会合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现代性话语/朱士群等著.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5. 6

ISBN 7-312-01773-8

I. 阶… II. 朱…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4322 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 23002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32 印张: 13.5 字数: 376 千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9.00 元

目 录

导 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现代性话语	(1)
一、问题的提出	(2)
二、问题的马克思解	(10)
三、现代性及其问题	(13)
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回应	(23)
五、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的进路	(37)
第一章 埃尔斯特阶级意识理论	(45)
一、对马克思哲学人类学的分析	(46)
二、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分析	(60)
三、埃尔斯特阶级意识理论	(72)
四、对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分析	(81)
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	(93)
第二章 罗默的剥削与阶级的普遍理论	(106)
一、生存经济中的剥削和阶级	(107)
二、积累经济中的剥削和阶级	(112)
三、剥削的普遍定义及其类型学	(116)
四、现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剥削	(123)
五、剥削的类型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129)
六、社会主义及其未来	(137)
第三章 古尔德纳新阶级理论和 CCD 文化	(144)
一、新阶级的基本内涵	(144)
二、文化资本和 CCD 文化理论	(154)
三、知识分子的异化和新阶级的未来	(162)
结语:新阶级的代言人——影响与评价	(171)
第四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	(173)
一、自然解放论与政治生态学	(174)

二、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	(184)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纲领	(206)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217)
第五章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228)
一、交往行动理论的提出	(228)
二、交往行动理论及其特征	(234)
三、交往行动理论的哲学基础	(239)
四、行动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248)
五、功能主义理性批判	(263)
六、帕森斯、韦伯与马克思的糅合	(278)
第六章 哈贝马斯的近期思想与现代性	(291)
一、理性批判与现代性问题的方法论重建	(291)
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	(306)
三、建立一个法律与民主的商谈理论	(319)
四、批评与回应: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	(343)
第七章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高度现代性	(353)
一、结构化理论	(353)
二、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	(370)
三、“第三条道路”政治	(383)
第八章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	(398)
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398)
二、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遗产的解读	(403)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遗产的现实意义	(419)
四、结语	(423)
后记	(427)

导 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现代性话语

自1968年“五月事件”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相继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生发了一些新现象和新变革。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极速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质的变更。其主要表现有：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第二，剩余价值生产形式发生改变，从而引起阶级结构的变化；第三，政治体制合法化的需要获得强化，合理性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第四，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私有、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已经来临。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迁，曾被视为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内核的现代性思想开始受到质疑，在艺术、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背离与反叛之声构成蔚为壮观的“后现代”潮流之主旋律。这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崛起。

如何审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如何评价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本价值成为当代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首要课题。本书的主要意图就是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对话者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成果的评介，展示他们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所导致的不同见解，以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和现代性在中国的行进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借鉴和获取在社会政治理论域与之进行对话的潜能。因此，对阶级意识、交往行动、社会合理性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对话者的中心话语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是对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社会政治理论领域关于现代性问题研究之必要的补充。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合理性概念是现代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社会合理性的界定正是现代性的目标。我们要捍卫现代性，就是要捍卫现代性对合理社会或社会合理性的追求。我们要捍卫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就是要捍卫马克思对社会合理性的规划。我们认为，在现代性与社会合理性的话语上，回到马克思，再回到马克思，把马克思对现代性和社会合理性的话语探讨个究竟，是绝对必要的。

什么样的社会是合理的？合理社会的标准是什么？当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就不仅在常识上表现了一种对合理社会的关注和追求，同时也含有一种对社会合理性概念的理论兴趣。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似乎被遗忘了。其实，社会合理性不仅是一切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无疑含有丰富的关于社会合理性概念和社会合理性标准的基本构想，这一构想作为我们提出和回答问题的重要起点，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此，我们试图以一种朴素的理论态度，做一些初步的讨论。

在当代社会政治理论中，由于韦伯的推动，“合理性”已成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或企图批判韦伯，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合理性概念，或企图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某些研究文献，“改造”马克思的合理性概念，其关注的焦点也是在合理性概念上。卢卡奇从阶级意识的角度寻求作为历史理性体现的阶级主体，并采用总体性方法建立一个实证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思路对后来的罗默、埃尔斯特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思想家如吉登斯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哈贝马斯则从交往行动概念入手，提出“重建合理性”的研究纲领，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合理性思想的当代内涵作出了富有新义的延展。对此，都需要我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回答。

1848年欧洲革命宣告了启蒙运动的社会合理性概念的破产：思

维与存在是那么不和谐,合理的远未成为现实的,反倒让位于不合理的现实。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批判改造了黑格尔的合理性学说,摒弃其观念决定论,继承其辩证的社会历史观,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科学的、实践的、辩证的社会合理性概念的新构想。

首先,马克思主张社会关系的合理性。从本质上说,启蒙运动倡导一个合理的新社会,但其“合理性”却是永恒的个人合理性,带有浓厚的抽象、空想和个人主义色彩。马克思主张的“合理性”则是社会关系合理性。也就是说,马克思扬弃了启蒙运动的永恒的个人合理性,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合理性概念,认为个人合理性只有在社会关系合理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马克思一个重要思想是,不是根据个人来理解社会,而是只有根据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科学地理解个人。社会关系使个人变成社会的人,社会的一定性质是社会的人的一定性质,反之,社会的人的一定性质也是社会的一定性质,离开社会和社会关系,人便失去其社会规定性。因而,社会关系是深入探究人的本质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①;“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其次,马克思主张生产的合理性。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性是哲学的、观念的合理性。虽然猜测到了劳动在社会发展中历史作用,但其主导思想是合理性与现实性的思辨同一。马克思继承了它的辩证成分,并通过持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了生产合理性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合理性必须基于生产关系的合理性。“生产”的概念为社会合理性概念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使之从空想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6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

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②

其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以上思想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③按照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大体上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阶段,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④

马克思上述论断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仅就社会合理性概念而言,可从中概括出如下要点:(1)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存在,而社会关系首先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它决定着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2)生产关系如“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则是合理的;(3)生产关系若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则是不合理的,就将导致变革生产力的社会革命;(4)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人剥削人的“对抗形式”,不适合

①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74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7-68

③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33

④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是合理的;(5)据以上之(2)(3)(4)诸点,人类历史将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演进到足以消灭这种“对抗”的新的合理的生产方式,走向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6)显然,社会合理性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合理性为根本前提。

最后,马克思主张实践的合理性。马克思以生产为前提的社会合理性概念,不仅具有科学解释社会的功能也具有改造社会的实践目的。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定性和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不赖人们的意志和意识而产生的,但由此不应得出合理的生产关系无须经过主体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改造实践便可自然而然确立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它是为实践服务的,而且只有与实践相联系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才具有现实性的力量。这就给合理性概念打上了实践的烙印。马克思认为,作为生产的主体的、作为潜在的合理性主体的工人阶级,代表着人类的普遍利益,其实践活动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能够消除其直接物质存在的不合理性,实现一切社会关系的合理性。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打碎资本主义社会枷锁的斗争是合理的,但合理性本身不只是单纯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有助于工人阶级的合理的革命实践。因此,社会合理性同工人运动是吻合的,工人阶级也只有成功地打碎束缚自己的枷锁才能最终证明并实现马克思的社会合理性概念。黑格尔在“合理的”与“现实的”之间划上一个思辨的等号,而马克思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着断裂现象,异化劳动就是一个明证,因而他以生产为前提,在二者之间打入了“实践”的杠杆,否认理论的合理性将天然地吻合于现实的合理性,否认现存的不合理性将自动地让位于理想的合理性,而主张“合理的”之转变为“现实的”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中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真理的问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因此,“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9

在于改变世界”^①。在这种实践中,主体不仅改造客观世界,把自己的力量、知识、技能、意图、目的转变为实物的形式,而且也改造主体本身。

总括以上探讨,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社会合理性的实质是社会关系合理性,而社会关系合理性的实质是生产关系合理性,但社会关系合理性和生产关系合理性的实现离不开人们合理的实践努力。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合理性概念具有具体性、科学性和实践性,说它是具体的,因为它不是抽象地界定个人和社会的合理性,而是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和具体的物质社会关系出发。这样就从“现实性”上把握住了个人和社会的本质,使社会合理性概念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说它是科学的,因为它以唯物史观这一伟大发现为坚实基础,以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的客观规律为根本依据,这就使社会合理性由空想变成一个科学的概念。说它是实践的,因为它否定了“合理的”与“现实的”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主张诉诸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来实现和确证这种社会合理性,这就使社会合理性概念从思辨领域扩展到实践领域,将其引以为实践的目的。

马克思逝世以来,反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然而,道路不是平坦的。面对 20 世纪一系列戏剧性场景,如中西欧革命的浮沉、苏联的兴衰、新中国的升腾等重大历史事件,许多人感到迷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遇到了“反常”。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反常”现象包括:(1)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发生在“落后”社会;(2)既存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兑现“解放”的承诺并未消灭剥削阶级分化;(3)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无产阶级似乎已融入资本主义制度,因而不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②。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不少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此作了认真的学术探讨。其中有可取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

在社会观上,卢卡奇深受韦伯关于现代社会合理性概念的影响。韦伯认为,合理性是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走向合理性—合理化是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1

② 参看: R·洛德里克. 哈贝马斯与批判理论的基础. 伦敦,1986. 142

业社会的普遍趋势。他结合科学技术来说明社会合理化进程,用工业进步、城市化、合理决策适用领域(如司法、经济、科层制、科层管理)的扩大、传统价值的贬值等等来说明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他看来,这一合理化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他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按照这一区分,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形式上是合理的,而“实质”上则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合理化导致生产方式的不合理化:一方面,合理化在生产效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合理化造成价值和个人社会意义的丧失。他写道:经济秩序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①。韦伯这个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合理性”构筑起来的“铁笼”,无疑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合理性概念的挑战。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方面承认“合理化”是“事实”,另一方面把“合理性”与“物化”联系起来,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回答这一挑战。他指出,“物化”是这么一种现象——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物关系的形式,这种形式越来越深入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通过“物化”,韦伯所谓的“合理化”成为超出人控制的、反过来奴役人的、类似自然的过程。他引证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认为“物化”源于“商品拜物教”,因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结果。资本主义不仅造成了“物化”,也为克服“物化”,冲破“铁笼”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无计划,经济的不合理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危机,而危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反过来会使维护整体的合理性成为问题,这就为革命创造了“客观可能性”。这样卢卡奇就证明,韦伯悲观的“铁笼”之说是片面的。

在卢卡奇看来,韦伯之所以从“合理化”引出悲观主义结论,原因在于他使用的是“形式合理性”的逻辑,卢卡奇对“物化”的分析,使用的是“总体性的逻辑”。因而极为强调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阶

^①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142

级觉悟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唯有从这一潜在的“普遍阶级”阶级意识的角度,才能够看到“隐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定的合理性原则背后的极端非合理性”^①。他以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论述为例,指出资本主义从合理性到不合理性的转变似乎是由于力量的“缘故”,而这种力量来自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行动。他写道:“历史上可以做到的事,在实际中光靠既定的直接性和它的‘规律’那种直截了当的发展是不可能达到的,而只能通过反复多次的中介过程而获得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以及对认识历史的辩证倾向有个明确的目标”^②,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就是“对总体性的渴望”,而总体性具体来说,又是一个“革命行动的问题”。他总结说,无产阶级只有靠他自己的行动“才能“克服物化”,“改变和解放自己”,而客观的经济进化并不能增加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它“给无产阶级的只是改变社会的机会和必然性,但任何改变只有作为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行动才能出现”^③。卢卡奇的上述看法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前期法兰克福学派一度沿着卢卡奇的思路,继续寻求作为历史理性体现的阶级主体,并采用总体性方法建立一个实证的合理性概念。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韦伯所说的“合理化”和卢卡奇所说的“意识物化”的全方位扩展,他们收回了寻求阶级主体的允诺,转而发动对“文化工业”和“工具理性”的大规模批判。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力图证明西方的理性本身就是成问题的,由此他们附和了韦伯对“合理化”的分析,感染了他的技术悲观主义,同时也完全丧失了对马克思的社会合理性概念的信任,并把卢卡奇肇始的浪漫倾向极端化了。这在马尔库塞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他宣称,技术合理性的形式本身或许就是意识形态的;技术的应用,甚至技术本身,都是对自然和人的一种有计划的、科学的、可计算

①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张西平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02

②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张西平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03

③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张西平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38

的、精确的控制；技术作为一种“历史—社会工程”，其结构设计本身就包含着社会及其占主导地位的利益企图加诸于人和物之上的一切。对他来说，韦伯的“合理化”所实现的与其说是“合理性”，毋宁说是一种特殊隐蔽的社会政治统治。这样，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由于“合理化”形成的“铁笼”的全面控制，社会合理性的希望就只存在于文化和心理领域，辩证法不是客观的、建设性的，而只能是主观的、消极的文化心理批判。

哈贝马斯像法兰克福学派其他理论家一样，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基于“生产”的社会合理性概念显得过于狭窄，不再适用了。那么，发达资本主义是否还存在促成社会改造的“危机”呢？在这方面，哈贝马斯既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又不同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他认为，导致社会改造的“危机”并未完全消除，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从经济制度转到管理制度。国家干预的扩大需要获得群众的广泛忠诚，这种忠诚在传统上是由文化舆论结构造就的。然而，国家不可能用管理手段维护或建立必要的、有效的规范结构，这种“合法性亏空”给社会改造留下了余地。于是，当国家企图包揽以往由市场力量和风俗习惯所支配的私人领域时，就出现了合法性问题，形成全面的意识形态压制、文化奴役和“生活世界殖民化”。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集中表现是人们之间不合理的、扭曲的交往关系。找出产生这种“系统地扭曲的交往”的条件，须以建立一种关于非扭曲交往的模型为参照系，其基础又须到具有全人类特色的、普遍的生活中介——语言中去寻找。他宣布：“我们最初的语句毫无疑问地表达了那种普遍的、非强迫性的交感倾向”^①。也就是说，语言是合理交往的原型，语言理论是交往合理性概念的基础。于是他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称为“普遍语用学”。从语用学观点出发，他认为言语必须满足“有效性要求”，即满足陈述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要求。这三项要求不只是语言的规则，也涉及到现实中的行动规则，即要求言说者呈现事实、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和表达言说者自身的主体性。他断言，交往行动合理化在意向表达的

① J·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 张博树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68

真诚性和规范的正确性方面大有可为,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的合理性最重要的标准有两个:(1)真诚性,即主体的行为所表达的意向是否合理;(2)正确性,即与行动规范相联系并在事实上被认可的有效性要求是否合法、适宜或正确。因而在在他看来,一切社会行动的合理性都“要靠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理解的主观际性来衡量,要靠与未扭曲交往之重建并譬而行的交感行为领域的扩展来衡量”^①。按这一标准,交往合理性是指交往行动的真诚性和正确性,它要求根除人际关系中的“交往屏障”,克服“系统地扭曲了的交往”。因此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实现交往合理化,改革交往工具——语言表达形式;社会改造的可能性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而在于交往关系的合理化、交往工具的真诚化和正确化。这样,他就把社会合理性归结为交往合理性。

二、问题的马克思解

我们可以把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等人的努力看作是重建马克思社会合理性概念的尝试。这些尝试在细节上都有可取之处,或多或少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的社会合理性概念的理解。但在总体上,他们的重建都背离了“生产范式”,脱离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因而也是片面的、不成功的。

卢卡奇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物化的分析、对合理性的理解,也有不少重大缺陷。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实践具有创造历史和现实的“救世”力量,革命实践的概念被赋予了过高的寓意。他的错误的要害在于,夸大主体的能动性,抹杀实践的客观基础,使合理性概念回复到黑格尔思辨的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尽管卢卡奇的主观意图是在新形势下保卫马克思的合理性概念,但事与愿违,这种理论上的浪漫主义后来给非理性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开了方便之门。

法兰克福学派扩大了卢卡奇的物化分析中表现出的反科学技术

^① J·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 张博树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23

的浪漫主义倾向,把它发展成所谓“工具理性批判”。他们照搬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具有“形式合理性和实质不合理性”的观点,将“事实”和“价值”的对立看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断言这种“实质不合理性”是不可逆转的,这就比卢卡奇倒退了一步。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铁笼”的不合理性,但认为几乎不存在冲破“铁笼”的现实可能性,企图以一种社会批判来同“铁笼”抗衡,寄希望于在心理领域挣脱“铁笼”。他们的批判固然从文化心理的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但也遮盖了这种不合理性的真正根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我们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终将经过人的实践,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统一。因此,社会合理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绝无可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新马克思主义之“新”,在于向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寻求思想资源。在这方面,哈贝马斯采取了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态度,这对于推动社会合理性问题讨论的深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的交往合理性概念也存在一系列缺陷:(1)他把社会关系归结为交往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包括交往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由于受生产关系制约而不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曾使用“交往”、“交往关系”等术语,但同时坚持一切交往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物质交往关系支配的。可见,社会关系与交往关系有联系也有区别,交往关系只有通过社会关系才能得到科学说明。因而,是社会关系决定交往,不是交往决定社会关系。(2)他把社会合理性归结为交往合理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其基础是生产关系)是社会合理性的基础,也是交往合理性的基础,普遍和谐的人际关系只有在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撇开生产关系的合理改造来谈论交往,试图从交往合理化入手寻找社会合理化的可能性,这是本末倒置。(3)他把交往合理化归结为语言理想化。哈贝马斯从理想语言模式中“发现”了个人道德意识发展和交往合理化的模式,试图由语言的真诚化、正确化来实现交往合理化,这实际上是结构主义语言中心论的路数。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是“由于和他

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它“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①。换言之，同现实生活相比，语言是第二性的。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来确定社会合理性的标准。

如上所述，马克思的社会合理性概念是社会关系合理性、生产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的辩证统一，其基础是社会生产方式。如果说马克思这一概念源于“生产”范式，那么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概念则分别来自“实践意识”范式、“文化心理”范式和“交往语言”范式。卢卡奇侧重于“实践合理性”，法兰克福学派从心理文化方面扩展了对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批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接近于“社会关系合理性”的层次。然而，这些范式都没有从“总体”视野来把握社会生活的全景，因而也不可能科学地界定社会合理性的概念和标准。唯有回到马克思以“生产”范式为基础的社会合理性概念，才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合理地重建社会合理性的概念，也才能够能引导出具体、科学、实践的社会合理性标准，才能走向“合理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应当指出，在西方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中间，对于马克思是否制订过社会合理性概念，也存在很大争议。有人认为，马克思当时身怀否定和改造社会的计划，而根据这一计划的革命实践要求，马克思主要关切的是批判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根源，即产生阶级压迫和政治控制的社会条件，并未致力于制定明确的、规范的社会合理性概念。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不仅为制定新的社会合理性概念提供了新构想，而且实际上还对社会合理性的标准作了规定，提出了极富启发性的研究纲领。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而这种发展取决于新的社会关系，它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②。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粗略地说，社会合理性标准至少包括：（1）从“生产力基础”来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4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6